

## 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李建新 聂磊 常庆玲

### 一、引言

我国人口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低生育水平过程之中一直存在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而西方社会低生育水平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和生育观念自发转变的结果。因此，在有关我国低生育率水平影响因素的讨论中，社会经济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文化观念成为三大主要的并列影响因素。在当今我国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重要的因素，加之传统生育观念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仍然存在，因此，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倾向于多生，一旦生育政策放开必然会引起生育率的大幅反弹。但另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即使在那些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地区，人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生育二孩，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社会经济因素正在上升，年青一代们正为追求自身发展而倾向于少生或不生。

那么，当前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社会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本文以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和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尝试描述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特征状态，厘清有关我国低生育水平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与争论。

##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以及生育率转变的理论研究，西方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乃至微观，这些关于人口转变或生育率转变（差异）的研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松建，1987；李竞能，2004）：第一方面是着重于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如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G. Becker）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R. Easterlin）的生育率决定的供需理论以及卡德威尔（J.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第二方面研究是着重于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如戴维斯（K. Davis）和布莱克（J. Blake）的社会结构的生育率理论、弗里德曼（R. Freedman）的人类生育社会学理论以及散落在众多经典研究中非经济因素分析，这类非经济的社会因素是如婚姻家庭关系、文化观念、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针对欧洲自“二战”婴儿潮之后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且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现象，西方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社会文化方面的扩散理论、性别均衡理论以及生育文化的解释等（Lesthaeghe&Van de Kaa, 1986；Van de kaa, 2008；Lesthaeghe, 2010；Bongaarts2001；贝克尔，2005；Morgan and King, 2001）。这其中，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比较综合，具有影响力。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缘起于欧洲，“二战”后欧洲各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婴儿潮之后，相继进入长时间的生育率低迷期，除了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之外，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针对这种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欧洲学者 Lesthaeghe 与 Van de kaa 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Lesthaeghe&Van de Kaa, 1986）。这一理论指出，相对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主要集中创新制度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前者是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对人们观念与制度变化的反映，是现代人们更注重自我实现、个人选择自由、个人发展以及个性解放的反映；后者表现为随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使得父母不再依靠子女，生活安排和生活方式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与此同时，教育系统覆盖范围迅速扩大，提高了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而教育和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导致

了婚育模式的改变 (Van de kaa, 1987, 2008)。其后 Lesthaeghe 又具体从婚姻、生育和社会三个方面概括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其中婚姻方面表现为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提高, 婚姻稳定性下降, 离婚率逐渐上升。与之相伴的是, 在生育方面, 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提高, 非意愿怀孕减少, 婚外生育、同居生育增加。而在社会方面, 家庭关系的重心也开始从“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 传统家庭生育观念趋于式微, 现代夫妻自身效用关注占据主位 (Lesthaeghe, 2010)。总的来说,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生活观念的变化, 即人们对婚姻家庭观念的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注重个人发展和满足的个人主义。

对于我国人口转变, 无论是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与“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如“诱导性”、“干预性”、“压缩性”等 (宋瑞来, 1991; 李建新, 1994, 2000a, 2005)。对于我国人口转变之中的生育水平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曾指出, 我国人口转变和生育水平下降有其自身特点, 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蒋正华, 1986; 顾宝昌, 1987)。不过, 对于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 生育文化观念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叶明德, 1991)。而针对西方贝克尔经济学理论的生育水平变化解释, 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村落生育文化的解释 (李银河, 1994), 特别指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因素。至此, 对于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影响因素形成了社会经济、计划生育和文化生育观念的三元说 (李建新, 2006)。21 世纪之初, 就我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而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 学者们又进行了相关的争论 (李建民, 2000a, 2000b; 于学军, 2000; 李建新, 2000b)。而今, 我国生育率水平已降至很低, 且生育水平一直低于更替水平, 这一看法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翟振武、陈卫, 2007; 杨菊华等, 2008; 郭志刚, 2008, 2010; 顾宝昌等, 2009; 王丰, 2010; 李建新, 2012)。

事实上, 我国已成为低生育水平国家, 宏观、微观有着这样的变化, 一方面,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 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人们特别是新生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已经让位于现代化的生育理念, 生育不再是延续家族血脉的必要承担。因此, 一些研究发现, 即使是在那些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地区, 人口也是多年来保持低增长模式, 实际生育水平均保持在计划生育政策水平之下, 即二孩以下, 并没有出现政策宽松所引发的生育反弹现象 (顾宝昌、王丰, 2008; 李建新, 彭云亮, 2012)。

另一方面，个体生育决策生育行为越来越理性化。这种理性化表现在人们生育孩子的效用成本对比上。如今人们生育子女和养育子女成本大大增加，这既包括父母生养孩子所需各种费用的直接成本，也包含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承受各种损失的间接成本，比如选择生育孩子就可能意味着会失去更高受教育的机会和更好工作的机会等，机会成本大大增高。养育孩子的直接、间接高成本都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的生育时间和数量，进而强化了当代社会晚育少生的趋势（陈卫，2005；郭志刚，2008；李建民，2009；王丰，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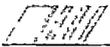
毋庸置疑，目前我国社会也呈现出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某些特征，如晚婚晚育的趋势、生育动机变化等。那么，我国这种低生育水平现状是否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呢？是否已经进入西方社会所谓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本文以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和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尝试分析我国目前晚婚晚育的变化特点及趋势；探讨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条件下影响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综合因素，分析传统生育观念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已婚妇女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

### 三、分析结果

#### 1. 晚婚晚育趋势分析

沿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特征，首先来考察我国婚育方面的变化情况。为了较好描述我国婚姻状况变化，这里我们采用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宏观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在婚姻、生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出现晚婚晚育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人口初婚年龄为22.79岁，2010年上升至24.85岁，其中男性初婚年龄由1990年的23.57岁上升至2010年的25.86；女性初婚年龄由1990年时的22.02岁升至2010年时的23.89岁（陆杰华、王笑非，2013）。

进一步分析我国男女人口未婚状态的不同代际变化，可以判定这种婚姻模式的基本走势。我们来看历次普查数据的相关结果，表1列出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组男性人口的未婚状况，四次普查中20~29岁未婚比例分别大致代表着“50后”、“60后”、“70后”和“80后”出生队列的未婚状况。从表中数据不难看出



出，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的结果比较接近，“50后”、“60后”、“70后”虽然在20~24岁、25~29岁的未婚比例有所不同，但在40岁之前都有95%左右的男性人口完成了婚姻。但2010年的数据则反映出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晚婚趋势，如20~24岁组，有82.44%未婚，25~29岁组更是上升至36.29%的未婚，大大高于前三次普查的同年龄组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0~29岁群体是“80后”群体，这个结果显示出“80后”群体的婚姻时间模式与“50后”、“60后”、“70后”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事实上，“80后”们这些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们其婚姻观念和行为更具现代性，更注重自我发展和需求，个人主义观念也渐趋成为主导性理念。因此，随着“80后”们渐次成为社会的主体，为追求较好的教育、较好的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生育的现象将会更加明显，也必将成为主流，而这些婚育特征将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常态。

表1 分年龄段男性未婚比例 (单位:%)

	20~24岁	25~29岁	30~34岁	35~39岁	40~44岁	45~49岁
1982	71.98	23.59	8.84	6.77	5.71	4.37
1990	62.45	16.71	7.16	5.73	5.17	5.07
2000	78.65	24.68	7.45	4.12	3.82	3.96
2010	82.44	36.29	12.62	6.44	4.15	3.12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女性人口未婚比例变化也有同样的特点。表2列出来四次人口普查分年龄组女性人口未婚状况，同样，四次普查中20~29岁未婚比例分别大致代表着“50后”、“60后”、“70后”和“80后”。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到，女性群体的数据特征与男性群体类似，只是相对而言，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的整体初婚年龄更小。“50后”、“60后”们约99%的女性在35岁之前完婚，“70后”们也有近95%的女性在35岁之前完成初婚。但是，2010年普查结果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在前三次普查中，25~29岁组的女性中，未婚比例在4%~8%，但到了2010年普查25~29岁组女性人口未婚比例迅速上升到了21.62%。如果说，前三次普查数据表明的是我国“50后”、“60后”、“70后”女性人口婚姻时间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话，那么2010年这一急剧变化则反映的是“80后”女性人口婚姻特征与以往截然不同，呈现出女性明显的晚婚趋势，这也是当今“剩女”话题不断的统计事实基础。

表2 分年龄段女性未婚比例 (单位:%)

	20~24岁	25~29岁	30~34岁	35~39岁	40~44岁	45~49岁
1982	46.45	5.72	0.69	0.28	0.20	0.18
1990	41.35	4.29	0.64	0.30	0.24	0.18
2000	57.46	8.67	1.35	0.51	0.29	0.21
2010	67.55	21.62	5.35	1.76	0.75	0.44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为了印证我国人口婚育行为代际之间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接下来,本文再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微观数据做进一步探讨。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其抽样科学、问卷设计全面且合理。这一数据的质量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谢宇等,2013)。这里我们使用事件史生存分析方法,计算出了CFPS 2010数据中不同出生队列的个体在30岁之前未婚和未育的风险值,见表3、表4。从表3可以看出,男性在30岁之前未婚和未育的风险是随着出生队列的先后逐渐上升的,未婚风险从1970年前队列的10.56%上升到“70后”队列的15.54%再到“80后”队列的19.56%,而未育风险则从1970年前队列的19.91%一路上升到“80后”队列的27.38%。这两个指标的统计检验都是显著的。

表3 不同队列男性30岁前未婚和未育风险对比 (单位:%)

出生年份	1949~1970年	1971~1980年	1981~1994年
未婚风险	10.56	15.54	19.56
未育风险 <sup>①</sup>	19.91	24.37	27.38

表4结果显示,各个队列的女性相对男性而言虽都更倾向于早婚,但未婚和未育风险的变化趋势则是一样,而且它们的差异仍然是统计显著的。综上所述,无论是普查中的宏观数据还是CFPS的个体数据都显示出我国的确在21世纪之初的十几年间开始明显呈现出了晚婚晚育的趋势。

表4 不同队列女性30岁前未婚和未育风险对比 (单位:%)

出生年份	1949~1970年	1971~1980年	1981~1994年
未婚风险	3.29	5.94	6.18
未育风险	9.02	9.94	13.84

<sup>①</sup> 此处未育指的是男性的配偶尚未生育。



## 2. 低生育水平的微观分析

第二次人口转变核心特征之一是人们自主地减少生育数量，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使用在江苏省进行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研究”的跟踪调查数据综合分析经济和文化观念因素对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调查组于2010年在江苏省进行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研究”的跟踪调查，该调查涵盖了江苏省三个地级市（南通市、苏州市、盐城市），共六个县级市（县），具体为张家港、太仓、海安、如东、东台、大丰，充分考虑到了江苏省内部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当地的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中的育龄妇女为抽样框进行科学地抽样，样本代表性较好。为了更好地厘清育龄妇女生育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这里选取了该调查数据中35岁以上的，且符合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已婚女性，入选样本个案为1643。做这样的筛选，主要是通过考察这些有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且已基本完成了生育周期的已婚妇女的生育行为，可以达到在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变量的条件下，分析对自主实际生育行为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因素。

在本节的分析样本中，首先我们看到，拥有二孩政策且35岁的已婚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为1.32，处于很低的水平。在这些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中，仅有32.4%实际生育了二孩，已经呈现出少生的特点。根据本节分析的目的，即实际“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生育一孩与生育二孩，其中生育二孩为参照组。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控制变量三个变量组。结合数据将文化观念因素操作化为性别取向、丈夫是否独生子女和妻子的生育态度。性别取向为二分变量，性别选择“无所谓”和“有所谓”；丈夫是否独生子女也为二分变量。关于生育态度，问卷中以五级量表的形式测量了女性对于生育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其中以下四题能够较好地体现女性的生育态度是较为传统还是较为现代：“把孩子养育成才，是为了自己会得到更好的回报”、“养育孩子很费力，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经济条件不应当要孩子”、“只有子女才能在晚年陪伴照顾我们”以及“人们要孩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笔者将其从最传统到最现代分别重新编码并进行求和，按照最终得分将负值、0和正值分别定义为传统生育态度、中间生育态度和现代生育态度。本文通过家庭收入和女性的教育程度来测量经济社会因素。家庭收入按照从低到高分分为低收入组、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女性的教育程度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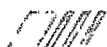
分为小学及以下水平、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水平三组。此外，城乡因素会同时作用于文化和经济因素，因此将其与女性年龄一起作为控制变量置于模型中。

表 5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性别偏好(有偏好)			
无偏好	0.402*** (0.112)		0.438*** (0.114)
丈夫是否独生子女(是)			
否	-1.076*** (0.159)		-1.056*** (0.16)
生育态度(传统生育态度)			
中间生育态度	-0.131(0.132)		-0.11(0.134)
现代生育态度	0.035(0.136)		0.015(0.138)
家庭收入(中收入)			
低收入		-0.308* (0.125)	-0.315* (0.128)
高收入		-0.587*** (0.169)	-0.567** (0.173)
女性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			
初中		0.412** (0.155)	0.477** (0.16)
高中		0.721*** (0.213)	0.682** (0.219)
丈夫户口类型(农村)			
城市	-0.529*** (0.145)	-0.505*** (0.148)	-0.606*** (0.153)
女性年龄	-0.153*** (0.02)	-0.160*** (0.019)	-0.143*** (0.02)
截距	7.601*** (0.788)	7.010*** (0.794)	7.020*** (0.824)
自由度	6	6	10
卡方值	160***	118***	184***
-2LL	1908	1951	1884
个案数	1643	1643	1643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变量列中括号内为参照组, 系数列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 5 给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一包含了文化观念变量组和控制变量组，从检验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即这两组变量的确会对女性的实际生育行为产生影响。文化观念变量组中，是否有性别偏好和丈夫是否独生子女两项是显著的，而生育态度则不显著。具体而言，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相对于有性别偏好的女性，无性别偏好的妇女实际会“少生”，即只生育一孩的发生比相对有偏好妇女高出 49% ( $e^{0.402}$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调查数据中，所谓有性别偏好的妇女是指，除了 45.5% 的受访者选取了对孩子性别无所谓以外，44.71% 的受访者都认为“一男一



女”是理想的性别构成，也就是说，这里性别偏好实际上主要是指那些有“儿女双全”偏好，而非早先的研究（陈震、陈俊杰，1997）指出的那样单纯追求更多男孩的偏好。与此同时，如果丈夫无兄弟姐妹，则妻子生育二孩的发生比会增加。在文化观念变量组的生育态度变量中，虽然“现代生育态度”相对于参照组传统生育态度倾向于少生，但统计检验则是不显著。对于这种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一，反映了这些妇女的生育行为差异未受到我们所列举的生育观念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影响式微的表现；其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里使用的是这批女性已经完成生育行为之后的截面数据局限所致，虽然在本研究时尽可能选取了相对不易随生育时间发生变化的观念进行分析，但是数据中包含的女性生育态度仍然可能并不是女性实际生育时的决策依据，因此，模型中假设的生育态度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的关系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得到验证。

模型二由社会经济变量组和控制变量组构成，模型的整体检验仍然是显著的。可以看到，在社会经济变量组中，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女性仅生育一孩的可能性均显著地低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即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多生”，似呈现出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资源之间的“U”形关系，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王丰，2010）。与此同时，女性的教育水平对于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倾向于少生。这既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注重个人发展需求的个人主义表现，也是贝克尔（2005）经济理性主义“女性的生育行为会随着自身时间价值的逐渐提高而减少”假设的验证，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其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其实际生育行为会随之减少。

模型三将模型一和模型二合并，同时容纳了文化观念变量组、经济社会变量组和控制变量组。从整体上来看，模型依然是显著的，而且卡方值也得到了提升。而从各个变量上来看，无论是显著度还是系数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两个变量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因此关于之前两个模型的结论在模型三中同样适用，在此不加赘述。不过，需要在此明确的是，即使是上文中被定义为“多生”的女性实际也只生育了两个孩子，这里的“多”只是低生育水平下相对的“多”而已。在这一个不受一孩政策限制的群体中，也只有1/3的妇女选择了“多生”即二孩。

##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非政策因素下的晚婚晚育特点，特别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们已经呈现出与上三代人（“50后”、“60后”、“70后”）显著不同的婚育时间模式，随着“80后”们成为社会主体，晚婚晚育也必然成为我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江苏省生育行为的微观调查数据中，研究发现，对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已基本上完成生育周期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已经呈现出少生的特点。在影响这种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因素中，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趋于式微，而个人发展需求与孩子的成本效用等社会经济理性因素在上升。显然，我国人口在全球性低生育率大潮中，已经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趋同性，这一方面在具体表征上，中国人口在婚育方面显现出自主性的晚婚晚育趋势；另一方面在影响因素上，现代生育观念和社会经济因素已经替代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主导性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文化观念解释与新家庭经济学的理性选择，都对当今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现象理解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本项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呼应了我国学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与贝克尔的争论。当年我国学者根据计生政策影响下个体自主生育权利的缺失以及农村不计经济后果的生育意愿及行为，认定贝克尔的成本效用分析不适于中国农村，并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降低农民生育率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李银河，1994）。如果说，彼时的论断在政策实施较为严格的90年代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深、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特别是“80后”们成为社会的主流，以往所谓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影响的论断已经不再具有适用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即是这一明证，传统生育观念不再，晚婚晚育已成为潮流。除了生育观念的转变，社会经济因素对低生育率的影响也越发重要。如今人们在进行生育时会有更多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是生活成本的增加，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数量。本项研究也再次证明，生育行为和经济资源之间存在着U形关系，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人数居多的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社会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间阶层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王丰，2010）。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显现，特别是新生代们的个体自主意识越来越趋于强



化,孩子不再是唯一的家庭重心,个体自我发展的目标以及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受到重视。综上所述,无论现代生育观念因素,还是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渐次减弱,那种所谓放开生育政策就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的论断已不再能够成立。

当然,本项研究还存在着不足,比如,截面数据局限以及江苏省社会经济状况的特殊性,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但尽管如此,由于江苏为东部较发达省份之一,可以认为这样的研究发现在较发达地区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随着“80后”们成为社会主体,这种变化趋势也将成为必然。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我国人口在婚育方面的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以及探究我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我国已经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人口社会新形势下,我国低生育水平已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时期。

## 参考文献

1. 贝克尔. 家庭论 [M]. 商务印书馆, 2005
2. 陈震, 陈俊杰. 农民生育的文化边际性 [J]. 人口研究, 1997 (6)
3. 顾宝昌. 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的作用 [J]. 中国人口科学, 1987 (2)
4. 顾宝昌, 蔡泳, 陈友华, 陈卫. 再论中国生育水平 [J]. 人口研究, 2009 (4)
5. 顾宝昌, 王丰. 八百万人的实践: 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 [J].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6.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J]. 人口研究, 2008 (4)
7.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 [J]. 学海, 2010 (5)
8. 蒋正华. 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J]. 人口研究, 1986 (3)
9. 李建民. 后人口转变论 [J]. 人口研究, 2000a (4)
10. 李建民. 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 [J]. 南方人口, 2000b (4)
11. 李建民. 中国的生育革命 [J]. 人口研究, 2009 (1)
12. 李建民. 人口转变新论 [J]. 人口学刊, 1994 (6)
13. 李建民. 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特点 [J]. 人口学刊, 2000a (5)
14. 李建民. “后人口转变论”质疑 [J]. 人口研究, 2000b (6)
15. 李建民. 滞后与压缩: 中国生育转变的特征 [J]. 人口研究, 2005 (3)
16. 李建民. 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计划生育调查之分析 [J]. 人口学刊, 2006 (5)
17. 李建民, 彭云亮.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



型应用 [J]. 人口与经济, 2012 (4)

- 18 李竞能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 [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李银河 生育与村落文化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20 陆杰华, 王笑非.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变化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 2013 (3)
- 21 彭松建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22 王丰. 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6)
- 23 谢宇, 张晓波, 李建新等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4 杨菊华, 陈卫, 彭希哲. 中国离极低生育率还有多远? [J] 人口研究, 2008 (3)
- 25 叶明德. 略谈我国传统文化对生育的影响 [J] 人口与经济, 1991 (1)
- 26 于学军 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 (2)
- 27 翟振武, 陈卫. 1990 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 [J]. 人口研究, 2007 (9)
28. Bongaarts J 2001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 419 - 443
29. Morgan S. P. and King R B. 2001. Why have children in the 21st century? Biological predisposition, social coercion, rational choi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7: 3 - 20
30. Lesthaeghe, R and Van de kaa, D. J., 1986. Two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Bevolking : Groei en Krump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Deventer: Van Loghum Slaterus
31.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 211 - 251
- 32 Van de kaa, D. J.,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1: 11 - 59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Washington, DC
33. Van de Kaa, 200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 Demography, [Ed Zeng Yi], in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EOLSS)*,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ESCO, Eolss Publishers, Oxford, UK, [<http://www.eolss.net>] [Retrieved September 2, 2010]